

庄子的思想世界

修订版

杨国荣 / 著



杨国荣
作品系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庄子的思想世界

修订版

杨国荣 /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庄子的思想世界/杨国荣著. —修订本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7. 4

ISBN 978-7-108-05752-5

I. ①庄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庄周 (前369-前286) 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6756号

责任编辑 杨柳青

封面设计 储平

责任印制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35 mm×965 mm 1/16 印张 28.5

字 数 306千字

定 价 68.00元

自序

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，我曾从不同的角度，对中国哲学中的有关人物、学派、思潮作过若干考察。90 年代后期，我的研究重心较多地放在哲学理论方面，涉及的论域包括伦理学（道德哲学）、认识论、形而上学等。当然，在史与思的互动中，理论之维与历史之维并非彼此悬隔；事实上，两者在更实质的意义上呈现相互交融的形态。以这种互动和交融为思考背景，2004 年，在完成有关形而上学的论著^①之后，我的侧重之点又回到了哲学的历史。相对而言，前此的历史回溯较多地指向儒家一系的哲学，2004 年的“转向”则首先以道家系统的庄子哲学为对象。

关于庄子思想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开始于上述阶段，但对庄子哲学的兴趣，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。从时间上看，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我便多次阅读《庄子》；庄子的言与思，一再使我领略到思想的力量。将近 10 年以前（1998 年），我又将道家哲学列入研究之域，并在完成《老子》哲学的初步考察

^① 2005 年，该书以《存在之维——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》为题初版，2009、2011 年再版时易名为《道论》。

后，拟转入庄子哲学的研究。但不久研究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原定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设想也暂时搁置。当然，暂时搁置并不意味着放弃该计划，而只是推延研究的进程。2004年，随着形而上学“沉思”的告一段落，庄子哲学便十分自然地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。

相对于先秦其他诸子，庄子其人与其学无疑呈现独特的品格。就“在”世方式而言，庄子的一生体现了为人、为学与为道的统一；从哲学系统看，庄子的思考涉及性与天道的各个领域；在言说方式上，诗意地说、思辨地说、逻辑地说在其哲学中彼此相融。以天人关系为指向，庄子既将人性化的存在提到引人瞩目的地位，又以合于“天”（自然）为理想的形态，并由此突出了自然的原则，人性与天道之间呈现了复杂的关系；从“道通为一”“以道观之”的视域出发，庄子对如何扬弃世界（包括观念世界）的分裂、达到统一的存在图景作了深入的追问；由肯定真知与真人的互动，庄子具体地考察了向道而思的过程；通过“道”与“德”、“我”与“人”的论和辩，庄子从不同方面澄明了个体性原则；以逍遥之境为指向，庄子进一步彰显了人的自由问题，如此等等。以上诸种论题的讨论，既呈现多重理论趋向，又内含主导的哲学立场，其中所体现的理论创造性和思想魅力，至今仍吸引人们不断向其反顾。

从更广的视域看，庄子哲学通常被归入道家之列。作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流派，道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理论足迹，其思想深刻地影响、制约着中国思想的衍化。晚近较为流行的看法有“儒道互补”说，一些论者则更倡“道家主干”论（以道家为中国哲学的主干）。这些看法是否确当或可进一步讨论，但它们无疑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和折射了一个基本事实，即

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。道家的这种不可忽视性，同时也表明：撇开或略去了其哲学，便难以全面地再现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。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，道家思想并不是以抽象的形态存在，而是体现于历史上的不同哲学系统，其中，《老子》与庄子的哲学，显然是其最为重要的源头和载体；与之相应，有关《老子》及庄子哲学的个案性考察，无疑既有助于更具体地把握道家哲学的理论意蕴，也将在更广的意义上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。

在文献的层面，本书首先将《庄子》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察，以再现其思想系统的完整形态和丰富内涵。以史与思的统一为进路，本书既致力于分析庄子哲学的内在主题及理论张力，并由此进一步把握其真实的哲学精神和思想脉络，也力图在总体上使哲学历史的考释同时体现哲学理论的沉思，从而一方面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，另一方面避免没有哲学的历史。当然，无论从“史”的维度看，抑或就“思”而言，本书都仍难免有自身的限制，这种限制，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历史回溯与哲学沉思自身的过程性。

导 论

在中国哲学史上，庄子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。以汪洋恣肆的文字为形式，以不拘常理的观念为内容，庄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想世界。不过，在进入这一思想世界之前，我们首先面临庄子其人以及《庄子》其书的问题。

关于庄子其人，现存的资料主要来自《庄子》一书及《史记》等有关记载。尽管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很难确切地考定庄子具体的生卒年，但仍可大致推断其生活年代约在战国中期^①。从有关的生平记载看，庄子虽有一定的社会名声，但并不显达。司马迁曾提及，“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”^②。类似的记叙亦见于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‘愿以境内累矣。’”“闻庄周贤”云云，表明庄子在当时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，“许以为相”则似乎意味着庄子亦曾有步入社会上层的机会。但庄子的实际生活境

① 司马迁在概述庄子生平时，曾指出：“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”（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）崔大华在这方面亦有较详考述，参见崔著《庄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—6页。

②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遇则始终显得清贫而寂寥，后者在《庄子》一书的如下记叙中不难看出：
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^①

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廩系履而过魏王。魏王曰：“何先生之惫邪？”庄子曰：“贫也，非惫也……”^②

“贷粟”使人联想到断粮之虞，家贫至需“贷粟”，其生活之窘迫，亦可由此推知。粗布敝履以见王侯，既反映了生活的贫寒，也体现了胸襟的淡泊：所见者虽贵为诸侯，其服饰仍一如往常。事实上，“过魏王”之“过”，亦颇有寓意：它表明，往见魏王，并非出于深谋久虑，而仅仅是偶然、随意之举。较之孔子、孟子热切地奔走、往来于诸侯之间，庄子似乎更多地表现出疏远于政治中心的趋向。

作为哲学家，庄子的哲学追求与他的存在方式，往往呈现内在的一致性。从哲学的层面看，庄子由齐物而主张以道观之，由反对以人灭天而崇尚逍遥之境，这种立场同样体现于其自身的生活过程。上文提及楚王曾遣使者聘其为相，按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庄子对此的回复是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太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，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。”^③《庄

① 《庄子·外物》。

② 《庄子·山木》。

③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子·秋水》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更为形象、生动：“庄子持竿不顾，曰：‘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者，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？’二大夫曰：‘宁生而曳尾涂中。’庄子曰：‘往矣！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’”“无为有国者所羁”，也就是超越外在政治关系对自我的束缚；“曳尾于涂中”，则隐喻着回到自然、走向逍遥。按庄子的理解，社会政治关系总是意味着束缚和限定，唯有摆脱这种限定，才能达到合乎天性的逍遥之境；在政治地位与逍遥的生活之间，庄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这种选择所体现的，是为学、为道与为人的统一。

当然，追求逍遥，并不意味着从社会之中抽身而去。庄子本人曾为“蒙漆园吏”^①，职务虽不高，但却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参与。庄子一再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忧虑，并反复表达了对窃国者侯等社会现象的不满，其中显然也蕴含着内在的社会关切。《庄子·刻意》更直接地对“离世异俗”的“非世之人”提出批评：“刻意尚行，离世异俗，高论怨诽，为亢而已矣。此山谷之士、非世之人、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。”对庄子而言，逍遥并非简单地离世，理想的形态是“不刻意而高”，“无江海而闲”^②。“无江海”意味着非隔绝于社会，而是在与人共处中达到逍遥，“至人”的存在方式便体现了这一特点：“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，顺人而不失己。”^③《庄子·刻意》及《庄子·外物》篇是否完全出于庄子本人之手，也许是

①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② 《庄子·刻意》。

③ 《庄子·外物》。

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，但以上批评无疑与庄子关注现实人生的立场相一致，不妨说，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和阐发了庄子的人生取向。

庄子生平中另一重要的方面，是教育活动。尽管有关的文献并没有具体介绍庄子如何聚徒授业，但从《庄子》一书的记载中，我们仍可依稀看到庄子这方面的经历。当然，相对于孟子“从者数百人”^①的规模与声势，庄子显得远为低调。同时，从授业方式看，与孔门每每或弦歌诵读或论诗说礼不同，庄子对文本的传授似乎并不十分重视。《山木》篇曾记载了庄子与弟子的出游和对话：“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枝叶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：‘无所可用。’庄子曰：‘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。’夫子出于山^②，舍于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‘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’主人曰：‘杀不能鸣者。’明日，弟子问于庄子曰：‘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，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，先生将何处？’庄子笑曰：‘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材与不材之间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，则不然。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；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？此神农、黄帝之法也。若夫万物之情、人伦之传，则不然。合则离，成则毁，廉则挫，尊则议，有为则亏，贤则谋，不肖则欺。胡可得而必乎哉？悲夫！弟子志之，其唯道德之乡乎！’”“行于山中”，意味

①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② 王叔岷认为，此句中“夫”乃“矣”之误，当属上句，《吕氏春秋·必已》所引相关文字无“夫子”，而有“矣”；“子”则系后人妄加（参见王叔岷：《庄子校释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47年，第35页）。此说似言之有据，或可从。

着置身于自然之间。山木因不成材而免于被砍伐的命运，雁却因不能鸣而被宰杀，弟子由此联想到如何处世的问题，而庄子则即景而给予开示。这是一种在自然之中的随处点化，它既体现了自然的原则，也表现了超乎文献、诉诸体验的思考方式。与弟子之间的如上相处和对话、讨论，无疑亦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社会参与。

不过，超乎文献，并非隔绝于思想界或学术共同体。从齐是非的立场出发，庄子一再对儒墨等学派提出批评：“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”^①这种批评，显然以了解和把握儒墨各家的思想为前提。对当时学界的一些论题，如坚白之辩，庄子也显得十分熟悉，《庄子》一书，从内篇到外、杂篇，都一再提及这方面的争论：“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”^②“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？”^③如此等等。这一类的评价，显然以洞悉名辩之学的得失为依据。此外，庄子与同时代的学人，如惠施，也有学术的交往，这种交往从一个更具体的方面体现了庄子与思想界的联系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曾对先秦诸子的各家作了系统的梳理，尽管此篇的作者究竟为何人尚可进一步研究，但其中所体现的学术关切（包括对学术源流的关注），无疑与庄子的思想趋向与活动相呼应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庄子的哲学沉思，始终没有离开哲学衍化的历史。

从学术旨趣看，庄子似乎较多地上承《老子》，司马迁在

① 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《庄子·骈拇》。

《史记》中已明确指出了两者的思想联系：“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^①之言。”^② 不过，“本归于老子”，并不表明庄子的哲学思想仅仅是《老子》的简单沿袭。如本书后文将具体论述的，庄子在哲学上有自身的独特进路，事实上，《庄子·天下》篇在论及各家学术要旨时，便对老子与庄子本身的思想作了某种区分，并分别加以评述，这种区分，显然有思想自身的内在依据。

庄子的言说方式常常被列入诗化之域。^③ 确实，庄子的思想中充满了诗人的想象，其表述方式每每体现为诗意地说，其文字则常常向人展示诗的意境，著名的庄周梦蝶，便是典型的一例。诗意地说与诗的想象和意境使庄子的哲学既不同于形式推绎，也有别于抽象的思辨，而是内在地渗入了具体的感受与体悟。不过，庄子在总体上并没有停留于文学的想象之中，其思想总是处处显示了哲学的洞见。同时，尽管庄子每每表现出质疑和解构理性世界的趋向，但他没有完全隔绝于逻辑的思维。事实上，在面向存在的沉思中，庄子往往将逻辑的推论视为重要的方式，关于开端、有无的追问，便表现了这一点：“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”^④ 这

① 这里所说的“老子”，主要与《老子》一书相联系。关于老子其人与《老子》其书的具体关系，学界尚存在不同看法。所谓“归于老子之言”，其实质的含义是肯定庄子与《老子》一书所内含的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。

②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③ 如葛瑞汉便认为：“他（庄子）用词不像哲学家，倒似诗人。”（A. C. Graham, *Chuang-tzu: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-tzu*, London: George Allen & Unwin, 1981, p. 26）

④ 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

里的上溯首先具有逻辑推论的意义：从逻辑上说，对于开端（始），可以追问在它尚未出现之前的形态；对“前开端”（未始有始也者），则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它之前的形态。同样，关于“有”与“无”，也可以作类似的推论。在此，形上的沉思与逻辑的推绎似乎彼此交融。

与庄子其人相关的是《庄子》其书。司马迁说庄子“著书十余万言”^①，但未提及《庄子》一书的篇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庄子》为五十二篇，郭象所注《庄子》，则仅三十三篇。现存《庄子》同时有内、外、杂篇之分，这种区分具体源于何时，现已很难考定，但内、外篇之分，至少在汉代已出现。陆德明在注《庄子·齐物论》“夫道未始有封”句时，曾指出：“崔云《齐物》七章，此连上章，而班固说在外篇。”^②“崔”即崔撰，曾有《庄子》注文二十七篇，^③由此似可推断，崔撰或见过班固的《庄子》注，而班固所看到的《庄子》，已有内篇和外篇之分。^④在郭象之后，内、外、杂篇的分别，大致趋于定型，

①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② 陆德明：《庄子音义》上，《经典释文》卷二十六。

③ 陆德明在列举《庄子》的不同注家时，曾提及：“崔撰注，十卷，二十七篇”，紧接此，又对崔撰其人及其注作了如下说明：“清河人，晋议郎，内篇七，外篇二十。”（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，《经典释文》卷一）

④ 关于内、外、杂篇之分出于何人之手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。王叔岷认为：“今本内、外、杂篇之名，实定于郭氏。”（《庄子校释·自序》，《庄子校释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47年，第1页）郭氏即郭象，需要指出的是，王叔岷所强调的是现存（今本）《庄子》的内、外、杂篇之分定于郭象。更早形态的区分为何人所为？张恒寿认为，此种区分始于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（参见张恒寿：《庄子新探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22—26页）；唐兰则认为内外之分起于刘向（参见《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》，《古史辨》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341—344页）；崔大华亦持类似的看法（参见崔著《庄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3—55页）。以上（转下页）

今本《庄子》基本上便源于此。

在内、外、杂篇的区分之外，尚有各篇的真伪问题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，对《庄子》之为庄子的作品并没有发生什么疑问，较早明确对《庄子》的某些篇表示怀疑的，是苏轼。在《庄子祠堂记》中，苏轼认为“庄子盖助孔子者”，由此出发，他写道：“然余尝疑《盗跖》《渔父》则若真诋孔子者，至于《让王》《说剑》皆浅陋不入于道。”^① 不难看到，上述质疑并没有实际文献上的依据，而主要基于《盗跖》等篇对待孔子的态度及与所谓“道”是否相合。然而，疑风既开，则不同形式的怀疑便往往随之纷起：“《庄子》书自宋苏轼以《让王》四篇为伪书后，元、明、清各代的学者如黄震、吴澄、罗勉道、焦竑、王夫之、姚鼐^②等人都对其中某些篇章，提出怀疑。”^③

真伪问题的主要焦点，是《庄子》诸篇是否出于庄子之手。近代以来，这一问题渐渐以各篇成书的先后为实际的关注之点。持存疑立场者通常认为，内篇为庄子所著，外、杂篇则非庄子的作品；对非庄子所作的各篇，或者视为伪作，或者理解为庄子后学之作，前者体现了较强的怀疑观点，后者的存疑倾向则显得相对温和。

关于外、杂篇非庄子所作的断论，每每首先基于思想倾向上的差异，除了前面所引苏轼的推论之外，王夫之的看法亦有一定代表性。在谈到内、外篇之分时，王夫之指出：“内篇虽与

（接上页）看法虽各有所据，但从现有的材料看，似都尚难作为最后的定论。

① 《庄子祠堂记》，《东坡全集》卷三十六。

② 见焦竑《庄子翼》、王夫之《庄子解》、姚鼐《庄子章义》等书。

③ 张恒寿：《庄子新探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9页。

《老子》相近，而别为一宗，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；外篇则但为《老子》作训诂，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。”^① 质言之，内篇有原创之见，外篇则仅仅依傍老子，两者表现了不同的思想进路，故非一人所作。近人罗根泽从另一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看法，按罗氏之见，《骈拇》《马蹄》《在宥》等篇的“圣人观”“仁义礼智观”与内篇不同，他由此得出结论：这几篇“就思想的系统说，可以推定在庄子以后”^②。怀疑外、杂篇的另一依据，是行文风格的不同，王夫之的看法在这方面也具有典型的意义。在论证《让王》等篇非出于庄子之手时，王夫之写道：“观其文词，粗鄙狼戾，真所谓‘息以喉而出言若哇’者。”^③ 根据文词的粗鄙而否定有关篇章为庄子所作，这种推绎亦往往为其他怀疑者所运用。与之相关但又有不同侧重的思路，是按字词出现的时间或运用的年代来推断某些篇章的真伪。如《庄子·天运》曾运用了“六经”一词，黄震据此指出：“庄子生于战国，六经之名始于汉，而《庄子》之书称‘六经’，意《庄子》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。”^④ 20 世纪 80 年代后，有的学人进一步从词的不同用法上，推论内篇与外、杂篇之异，据其统计，内篇虽用了道、德、性、命、精、神等单个词，但没有使用道德、性命、精神等复合词，按汉语演化的历史，复合词具有后起的特点，从而，

① 王夫之：《庄子解》，卷八，《船山全书》第十三册，岳麓书社，1996 年，第 184 页。

② 罗根泽：《〈庄子〉外杂篇探源》，原载《燕京学报》，1936 年，第 36 期，参见《罗根泽说诸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232—235 页。

③ 王夫之：《庄子解》，卷二十三，《船山全书》第十三册，岳麓书社，1996 年，第 348 页。

④ 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，卷五十五。

运用复合词的外、杂篇亦应后出。^①

对《庄子》内、外、杂篇作者归属、成书年代的如上推断，当然并非毫无所据，但从文献考证的角度看，在无原始版本作为参照的情况下，这种推论总是具有清儒所谓“虚会”的性质，而无法视为“实证”。事实上，以思想趋向、行文风格为推断的前提，便很难避免主观的揣测：由于视域的差异、立场的不同，同一类篇章，往往一些论者斥为观点浅薄、行文拙劣，另一些论者则可能赞其意深文佳。^② 用词的时代差异虽显示了某种历史的特征，但仅据是否运用某些复合词，同样也不足以遽断作者的归属或年代的先后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《庄子》内篇中固然未使用“道德”“精神”“性命”等复合词，但并非完全不运用一切复合词，诸如“是非”“天地”“宇宙”“有无”“逍遥”“仁义”“阴阳”等复合词，在内篇中便甚为常见。同样，“道”“德”“精”“性”等单个词，也大量地被运用于外、杂篇。仅仅挑选某些单个词或复合词作为立论的依据，至少是不充分的；在内篇与外、杂篇都既运用复合词，也运用单个词的情况下，情况尤

① 参见刘笑敢：《庄子哲学及其演变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—13页。

② 例如，杂篇每每被视为粗陋之作，但林希逸对杂篇中的《庚桑楚》则极口称道：“此篇文字，何异于内篇？或曰：‘外篇文粗，内篇文精’，误矣！”（《庄子庸斋口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371页）又如，朱熹对《天道》篇的有关论点评价甚高（参见《朱子语类》，卷十六），王夫之则认为其“所见者卑下”（王夫之：《庄子解》，卷十三，《船山全书》第十三册，岳麓书社，1996年，第236页）。对同一类篇章的评价之异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其是如此。^①

可以看到，仅凭“虚会”，缺乏基于原始文本的“实证”，显然难以对《庄子》各篇的归属及年代作出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。^②如前所述，将《庄子》分而论之者一般把内篇与外、杂篇之分作为判断作者、成书年代的基本前提，以内篇为庄子的作品，外篇与杂篇为后人之作。^③然而，事实上，内篇与外、杂篇在作者、成书年代以及所谓“精”和“粗”等问题上，并非如其表面上呈现的那样界限分明。宋代的林希逸已注意到这一点，针对所谓“内篇文精，外篇文粗”之论，他强调《庄子》其书“本无精粗”：“《庄子》三十三篇，分为内外。内篇有七，皆以三字名之，自《骈拇》而下，则只掇篇头两字或三字为名，如《学而》《为政》之例。其书本无精粗，内篇、外篇皆是一样说话，特地如此，亦是鼓舞万世之意。但外篇文字，间有长枝

-
- ① 同时，与其他先秦文献相近，在《庄子》那里，篇章与词句也存在某种复杂的情形。原始或早出的篇章在流传的过程中，往往可能掺入某些后起的词句，如《中庸》一书中即有“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等表述，这些文句显然出于秦统一六国之后，但若据此将《中庸》完全归入秦以后的作品，则不免过于草率。前文提到的《天运》篇中所出现的“六经”一词，也很可能属这一类情况，我们不能将《天运》整篇与其某些词句简单等同，也不应仅仅根据其中有个别晚出的词句，便判定《天运》的整个篇章都是后起的；正如不能因《中庸》含有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等词句，便断定其为秦汉以后的文献一样。
- ② 有必要再一次指出，关于《庄子》各篇归属问题的各种看法，在发现原始文本依据以前，都具有假说的性质，无法视为定论。
- ③ 在这方面，任继愈的观点略显特殊：与通常将内篇视为庄子作品、外篇与杂篇看作后人之作不同，他断定外、杂为庄子所作，内篇则晚出。不过，在以内篇和外、杂篇之分为判断前提这一点上，任继愈与其他论者仍有相通之处。（参见任继愈：《庄子探源》，原载《哲学研究》，1961年，第2期，又见《十家论庄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87—196页）